

60

名农民工的动人讲述 农民工生存境遇的缩影



告别 工地

西海固农民工生存纪实

李禄胜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北民族地区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
(10BRK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告别 土地

西海固农民工生存纪实

李禄胜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告别土地：西海固农民工生存纪实/李禄胜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 7

ISBN 978-7-80170-912-7

I. ①告… II. ①李… III. ①农民工生活状况
IV. ①D42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3069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柯琳芳
责任校对 王小芸
装帧设计 古 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2 66572264 66572154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4.75 印张 插图 19 幅 2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序一

劳务经济与农民工的主创性

齐 岳*

农民工在时下的媒体语言里是一个热门词汇，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其中既有关于农民工的新闻报道，又有大量研究农民工问题的学术文章。那么，什么是农民工呢？现在一般的解释为：户籍仍在农村，有自己的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工作，以自己的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可是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对这种在农村有自己的承包田又在城市或者在其他地方从事非农工作的人群社会不能给他们一个明确的称谓，叫工人吧他们的户籍在农村，叫农民吧他们又天天在城里上班。直到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通讯》首次把这类既有承包田又在城里做工的人称为农民工。自此以后，在中国的职业人群分类里才有了农民工。

在宁夏西海固，早在农业社的时候，各个生产队就选派队上有手艺的人外出揽活挣钱，人们俗称搞副业。言下之意，农业种植是主业正业，在主业之外挣两个零花钱就应该叫搞副业。西海固土地贫瘠，十年九旱，遇到大旱之年，农民辛勤耕作一年收获的粮食仅够半年吃，这时搞副业挣回的钱就不仅是作为农民的零花钱，而是作为生产队到丰粮区购买粮食的购粮款。为了生活，许多农民都有外出务工的强烈愿望。当时的好多公社几乎队队有自己的专职副业队，副业队的人数少则一二十，多则四五十。我们如果从产值来衡量，副业队的非农收入几乎能与生产队的农业收入平分秋色，而在大旱之年，副业队的非农收入几乎就是生产队的全部收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西海固与全国各地农村一道推行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改革，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的发挥，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并发展，与此相伴，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富余农业劳动力。这些富余出来的劳动力积极地寻求着转移就业的途径，随之而来的城市改革为他

* 齐岳，宁夏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们提供了外出务工的渠道。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海固各个县市的城市建设项目及其他建设项目逐渐增多，那些进城务工的富余劳动力在原来副业队的基础上组成了新的建工队，他们承包了几乎县城里所有的建筑工程项目。而一些有建材手艺的农民则把原来生产队的砖瓦窑改扩建为新式的建材厂，给建工队输送建筑材料。建工队建材厂组成了成龙配套的建筑产业链。那时各乡都有建工队和砖瓦厂，比较大的乡镇有两三个建工队，有规模宏大的机砖厂。这些在建工队和建材厂上班的农民工早晨出村干活，晚上收工回家，农闲时间搞副业，农忙时节回家干农活，既经营了承包田，又获取了农业外的收益，这就是“离土不离乡”务工的好处。

西海固的农民工大量走出大山，“离土又离乡”到周边大中城市打工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银川等西北内陆城市在沿海第二轮经济快速发展的带动下改革逐渐加快，城市经济迅猛发展，这就为西海固等贫困地区农民进城务工、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省内县外转移就业创造了条件。那时在银川的各个建筑工地上随处都能碰到一个个衣衫脏旧、说话带着一口浓重山里腔的西海固农民工。他们要么抬灰和浆，要么码砖砌墙，一栋栋办公楼、商住楼在他们的铁铲瓦刀下拔地而起。

西海固农民工与全国其他地方的农民工一样在外出打工时也备尝了艰辛，付出了超值的血汗甚至生命。他们从事的大都是苦脏累险的工作，他们劳动的强度和时间远远超过了城镇职工每天八小时的定规，可是他们的生活待遇不能与城镇职工同日而语，吃的是城里人不屑一顾的饭食，睡的是四面透风的工棚。在城市人的眼里他们是来自乡间的草根，他们是水底下的泥鳅。他们以超强的生命力生存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他们是都市里的外乡人。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的退去，第二代农民工的生成，西海固农民工与全国农民工一道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随着国家对务工环境的改善，西海固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充分认识到扶持农民外出务工就业的重大意义，积极与发达地区联手，输送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异地务工就业，比如规模宏大的闽宁对口帮扶，就使相当一部分年轻有文化的农民工到沿海发达地区就业。农民外出务工，输出的是富余劳动力，收获的是相比经营农业丰厚得多的务工收入，这些收入一部分用来改善农民的生活，另一部分则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可以说，在西海固地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劳务经济功不可没。如今，西海固各级政府确立了发展劳务经济、打造劳务产业的战略思路，以劳务产业带动农业产业化，并增加农民的收入。

研究农民工问题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近几年农民工问题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经过研究，学者们对农民工问题进行了历史的梳理和现实的横断面剖析，指出了农民工问题的成因，揭示了农民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巨大贡献，预测了农民工群体的未来发展趋势。应该说学术界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是全面的深入的，对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的建议是中肯的有建设性的，这些建议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但在看似全面的背后却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缺漏，那就是很少有学者从主体性的角度关注研究农民工。农民工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以自己的劳动力参与了商品价值的形成，但他们本身又是一个有着自主意识的主体，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是有认识的，他们对劳动的效果是有自己的评判的。而学术界总是习惯于把农民工仅仅看作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客体，看作劳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看作产品价值形成中的一个要素。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也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它忽视了农民工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创造性。中国的农民阶层始终蕴涵着巨大的创造力，中国的农民始终以自己的创造性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比如说，从农业社时代各地农民自发外出“搞副业”挣钱，到后来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再到后来的兴办乡镇企业发展农村经济，哪一个不是农民自主的创造？因此，有学者对农民工给予了很高的赞誉，称农民工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又一伟大创举”。

研究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性，有助于了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困难和诉求，对把握农民工未来务工的去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此前很少有人用这种方法研究农民工的打工生活，李禄胜同志的《告别土地——西海固农民工生存纪实》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好头。他出生在西海固地区，对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有着特殊的感情，又有着十多年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经历。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他一直关注农民工问题，曾在《中国人口科学》、《宁夏社会科学》、《市场与人口分析》等刊物发表了二十余篇关于农民工的相关论文，另有一些关于农民工的相关论文被十余本书籍收录出版。2005年关于农民工维权问题他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后，被全国155种报刊纷纷转载。他的作品独辟蹊径地让农民工讲述自己打工过程中的感人故事、谈论自己外出务工的感受和表达对未来生活的希望，让我们走进了农民工的心灵世界。

2010年5月于银川

序二

走出大山，勿回头

党国英*

为禄胜君《告别土地》的出版而高兴。

时下有很多反映较底层百姓生活的出版物，其中大多反映百姓们的艰难生活和他们遭遇的不公正待遇。禄胜的这本书很特别，它讲的是宁夏西海固农民外出打工的故事。尽管故事的背景颇为苍凉，但其主调是温暖的。阅读全书，我们对未来会多了些乐观。

对较底层百姓的境遇，理解比同情更有意义。西海固的年轻农民离开山区到城市做工，尽管在城市会遭遇一些屈辱，但他们和自己的过去比，心下就有了希望。他们大多以积极心态对待自己的新工作，其精神每每令我们感动。

我想，那些对农民进城心存疑虑的人们该读读这本书。农民进城的道理说起来也简单，那就是他们要摆脱贫穷，要过更好的日子。遗憾的是，这样一个道理，并不是人人都能懂得。

世人有种种无知，我自己也一样。某些类型的无知无碍大义，但有的无知则不单单是个人的孤芳自赏。我这里要说的是对贫穷的无知。这种无知好像有些雅致，也好像有些善意；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后果，似乎也最值得原谅。若果真这样，那算我说多余的话。实际情况是，这种无知可能很普遍，且这种无知可能成为一种可怕政治主张的基础。

过腻了都市现代生活的年轻恋人，若忽然冒出了爱情的傻气，说要远离尘世的烦恼，走到山里去，过一种男耕女织的生活，就有了一种浪漫情调。如果他们果真去了山里，孤身俩人，不出仨月必定蓬头垢面，自然也就浪漫不起来了。如果他们真有异乎寻常的价值观，能坚持过这种生活，他们自己乐在其中，而亲友们有了饭后谈资，也算各得其所。但从社会角度看不是这样。

当有人真正采取行动过山民的简单生活时，一定有理由说全社会还会有

*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不少人不得已过这种生活。而一旦这些过简单生活的人聚集起来，浪漫情调就荡然无存了。没有了现代手段，生活资源的紧张就不可避免；人们就会为争夺资源而争斗。争斗中的人们又要结成团队，而团队生活的规则是人身依附。那是一种经过秩序化的、有某种温情“文化”外观的人身依附关系。当今时代，那些在城市现代生活熏陶下的年轻人常常只看到物质生活的简单，并以为这种生活可以忍受；但他们看不到那种人际关系的不堪，更想不到这种关系的存在具有必然性。我们和比我们年龄更长的人们有过对贫穷的生活的体验；在这种生活中发生在人际之间的恐吓、强制和各种奴役性的潜规则所带来的精神折磨，远甚于物质贫穷的痛苦。典型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村生活不是《艳阳天》、《创业史》和《刘老根》里描述的那种生活，而是陕西作家陈忠实《白鹿原》里的生活，是《红楼梦》里焦大和刘姥姥过的生活。前不久我去了几个不同地方的山区村庄，我注意到山里的农民的物质生活已经有很大变化。在某个深山区的村庄，农户们依靠山货的采集和销售甚至获得了高于周边城市居民的收入，但那里的年轻人还是争相离开山村，到城市呼吸相对自由的空气。我很能理解他们。

在我们国家，见诸报端的文章中也总有对现代性的怀疑。例如，汽车要不要禁止？农民要不要进城？城市要不要扩大？工业要不要发展？关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似乎都有了否定的意见。归根结底，他们以为现代经济替代简单贫穷的自然经济意味着我们犯了一个大错误。于是，在他们那里就有了对现代性的广泛批判。我想提醒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我们不可相信这种批判。要记住，只有现代性才可能给人们提供独立和自由，而传统自然经济不仅意味着物质的贫穷，更意味着精神的奴役。现代性在它自己的实现进程中也有不如意的地方，甚至充满了血和泪，但这可能是我们告别奴役的代价。我们只是想让这种代价来得小一点儿。

一家农户若仅仅靠五六亩庄稼地维持生计，年收入两三千元，自然是贫穷的。在我国政府推行了一些农村保障措施和义务教育完全免费措施以后，这样一家典型农户大体可以过一个温饱生活。但总的来说，这样的农户是中国农村的穷人，我把他们称为传统穷人。

还有现代穷人，他们是卷入经济分工的城市穷人。每年收入两三千元的城市四口之家，连过一个温饱生活都成问题。他们必须至少有十倍于这个数的收入。所以，进城的农民要真正在城市定居下来，必须有更高一些的收入。我遗憾地看到，西海固农民进城以后要挣到这个钱还不很容易。

传统穷人和现代穷人的生活有本质的差异。传统穷人可以过自给自足的生活，公共生活的空间很小，必要公共支出可以接近零。现代穷人处在社会分工体系中，人们之间的能力差异被货币交易放大了。更令人难受的是，城

市的社会公共服务有某种强制性，且大量公共服务是城市精英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每个人必须购买。进城农民不能用柴薪起火造饭，必须用天然气或电能；他们必须交社区物业服务费，即使他们家徒四壁，无惧贼人光顾。他们可能不交纳个人所得税，但各种间接税非交不可，因为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各种公共“服务”，这些“服务”要由他们埋单。他们上路要交过路费，因为没有自由的马路可走；他们必须买报纸、看电视，因为城里没有口头消息传播的管道。总之，他们要为数不清的“公共服务”付账。就这样，现代社会似乎不允许存在穷人；如果在现代社会做了穷人，他要比传统穷人更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不幸。

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人是趋利避险的动物。如果农民的地还在，房子还在，他们还是非常愿意试探一下城市生活的奥秘。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如果能在城市落脚，并对未来有一定信心，可能完全放弃乡村生活。这种选择也有其中的道理。千万不要简单地以为城市是十八层地狱，传统农村是世外桃源。

在典型城市，由于广泛的专业化分工，人们处在商品与服务的交易网络中，而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交易必须平等，否则交易就完蛋。城市政府固然会强制供应公共品，但也因为城市生活的多元化，城市政府也必须中立，否则城市政府也迟早要完蛋。传统乡村生活不是这样。人们在经济上几乎没有依赖，交易的公正性要求没有直接表达的机制，社会平等就不是人们的主导观念。简单的经济也使公共权威很难公正行使，经济以外的人身依附和强制就成了必然。

在城市，穷人有望变成富人；但在传统乡村社会，焦大几乎没有什么可能变成贾宝玉。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青年农民喜欢进城的原因。当然，城市发展水平也很不相同；有的国家的城市可能就是传统村庄在空间上的堆积，这样的城市没有魅力，也很可怕。但只要是城市，它就有进步的希望。此外，在政府帮助穷人这件事情上，城市做起来要比农村容易。

基于上述一些认识，我对李禄胜以热情的笔调来描述西海固农民的城市生活，有一种认同感。

禄胜君是一位很勤勉的学者。他的主要工作是撰写研究报告，发表过一些有价值的作品。他为了在更大的范围里向人们介绍农民进城以后的生活，写了这部作品，值得褒奖。从2009年开始，他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我有幸认识了他，并向他学习到了不少东西。在他的书出版之际，他要我作序，我便写下这些文字。是为序。

2010年5月于北京

自序

我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因为关注点在农村，经常到农户家中进行调研。在调研中发现，农村的许多变化都和农民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于是便在调研中逐渐走进了农民工的生活。十余年来，只要听说农民工动人的故事，我便默默地记下；每逢春节农民工返乡期间，便和他们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来到任何一个城市，都忘不了到工地上去看看；到餐馆吃饭，免不了问问他们的经营状况；在一些劳务市场和政府机关则以调研者的身份，从经营者和官方那里获取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在采访中，或者通过对话，或者通过听他们的讲述，我可以从他们的口里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在采访农民工时，我心里很难过。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人不愿意接受采访，假话不爱说，实话不敢说，好话不想说。后来，我只能把笔和纸藏起来，先和他们拉家常、套近乎，然后和他们闲聊，等聊完离开了他们以后，再进行文字整理。

在写作中，300多个个案采访记录堆成了一个“小山头”，其中不乏典型例子，也有许多值得一写的故事，但由于作者和当事人阴差阳错而终成遗憾；另外还因为自身的工作和精力不能及时跟进，错失了许多采访良机，也成为本书写作中的一大缺憾！为了能全面了解农民工生活，经过梳理归类，从300多个个案访谈中筛选出了最具代表性的57例。由于西海固地区农民工遍及全国各地，他们的打工生涯既是对本地区农民工的生活写照，也折射了全国农民工的打工之路，是全国农民工生活的一个缩影。部分访谈是真姓真名真地址，这些人大都是打工成功者，他们对家庭、对家乡、对一方经济及社会有着巨大的贡献。另一部分访谈由于涉及到了个人隐私，用了化名。

这些受访者来自西海固地区九个县（区），他们当中，既有文盲，也有大学本科毕业生；既有做工的、做生意的，也有在异地他乡种地的和放羊的；既有承包工程或搞管理的，也有在餐厅端盘子和在城里当保姆的；既有人

按摩踩背的发廊妹，也有拉蜂窝煤和蹬人力车的壮汉子；既有开出租、跑运输、当导游的成功者，也有生意场上遭遇十分悲惨的失败者；既有通过打工喜结良缘的一对对新人，也有因为夫妻长期分居而婚姻出现裂痕分道扬镳者；既有对生活充满信心、百折不挠者，也有一蹶不振、精神萎靡、得过且过者。他们外出打工的心态各异，有的是为了开阔视野、学到本领，有的是为娶媳妇延续血脉，但绝大多数人都是抱着赚钱的心理而走出大山的！

从我所采访的 300 多例事实中，还可以发现西海固地区农民工群体的如下特点：

从性别来看，男性是打工队伍的主体。但随着人们思想意识的改变，女性从以往的足不出户到逐渐走出家门，表明女性的思想解放、意识的觉醒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妇女外出打工的人数逐年攀升是一个喜人的变化。这是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巨大成果，也是广大农村妇女对几千年来套在妇女身上封建枷锁的有力驳击。

从民族成分来看，汉族多于回族。西海固地区是回族人口聚居区，回族的农民工数量不多，是由于他们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与经济发达地区有很大差别。

从年龄结构来看，年龄最大的 65 岁，最小的外出打工时才仅仅 11 岁。他们的平均年龄为 36 岁，打工主体是中青年人，大多集中在 20—40 岁之间。

从文化程度来看，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了一半以上。与 20 世纪 80 年代相比，初、高中文化程度人数逐年上升，在文盲人数渐减的情况下也有了大专文化程度及以上的打工者。这说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者的知识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第二代农民工生成，未来 20 年内，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将逐渐提高。

从地区分布来看，西海固农民工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从东北黑龙江农场到西南拉萨河畔，从新疆西部的阿克苏到东南沿海的厦门市，从北部的呼和浩特市到深圳特区，从祖国首都北京到宁夏自治区首府银川，无不留下了他们匆忙的身影。

从时间上来看，由 20 世纪 70 年代的偷偷摸摸搞副业，到改革开放之初的三五成群，再到现在每年五十余万人次的打工大军，40 年的风雨历程，40 年的探索与追求，见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巨大成功和我国农民文化的觉醒，它还诠释了 40 年间经济社会和科技文化的伟大变革，展示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从打工成败来看，成功占多一半，希望大于失望。随着国家对农民工的关心和重视，打工环境逐渐改善，成功者的比例逐渐上升。由此可以看出打工经济还会发展，占农民收入的比重还会增加，进城务工确实是当地农民致富的途径。打工的道路尽管曲曲折折、坑坑洼洼，有陷阱、有欺骗，甚至有血的代价，但这是一条充满希望之路！西海固属老、少、边贫困地区，从目

前来看，该地区最好的脱贫致富之路是劳务输出，政府应该把钱花在劳务培训和输出服务上，把务工经济当做一项产业来抓，把给务工者服务当做政府的职责。

从打工行业和选择地来看，一半以上的打工者选择建筑行业，其次是厂矿和服务业。西海固地区打工者在地域选择上首选银川市，其次是本区经济开发区，再次是东部发达地区。打工行业和选择地与性别和年龄有很大关系，男性多在建筑行业，女性多从事服务性行业；年龄大者多在本区就业，年轻人较多流入沿海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家“两免一补”政策的落实，举家外出的逐渐增多，这已成为一种趋势。

农民工外出打工面临的主要困境：一是农民工本身属于弱势群体，发展起点低，职业拔高的时间缓慢；二是大多从事体力劳动，属于“生存型”工作，没有时间、精力和财力实现自身的提高和发展；三是看不到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预期，提高自身技能和素质的积极性被抑制；四是各种不平等的待遇成为他们在城市里发展的障碍，进而使他们从心理上对城市产生叛逆；五是农民工的文化层次较低，使他们始终处于低层次的产业领域，从而导致其难以成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高素质的产业大军；六是农民工对子女教育的期望以及夫妻长期分居两地的困扰，都将影响农民工家庭及其后代的后续发展。

在本书的整理和写作中，我尽量用农民工的语言来表述。他们的语言表达并不完美，谈吐并不自如，但都生动真实地表述了他们自身的艰苦经历和生活的亲身体验。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是一项义不容辞的职责。调查研究的方法很多，本书属于个案调查。让我们通过西海固农民工真实的叙述来感受当代中国农民工生存的艰辛与勇气，求索与期盼。而正是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让我们看到，制度的不公、法律的缺失、社会等级的自然生成、城乡之间相互分割的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以及城乡户籍隔离政策等等问题，仍然大量存在于这个社会当中。无论是从社会公正的角度还是从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整体结构功能的角度去考察，这都是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深思的问题。

目 录

第一篇 艰苦经历

黄土旱塬上的麦客子	2
一波三折	9
难忘那短暂的经历	18
人世间的变奏曲	24
煤厂里的风波	26
天上不会掉馅饼	29
空中的钱，雾里的花	36
自讨没趣	41
我是包工头	42
我们像英雄一样“逃离”	46

第二篇 冷暖人间

团结的力量	49
人间冷暖他最知	56
缩在心上的疙瘩	61
丈夫的权利谁来保护	63
爱心，让我对社会心存感激	67
雪里送炭的“两免一补”	71
我的“家”	80
赢了官司拿不到钱	83
要钱的门道	88

打零工的民工很难缠	89
跨出这一步	91

第三篇 情感世界

拉萨河畔的牵挂	94
打工与彩礼	100
沉重的爱	106
娶了一个城里媳妇	109
无根的生活需要勇气	114
为了爱情而奋斗	119
亚克喜餐厅	121
走出大山是另一片天地	123
路越修越宽广	124
法盲的悲剧	127
后院失火	130
风流背后的烦恼	134

第四篇 女性之路

泥鳅也是鱼	139
顶梁柱倒了以后	147
一个走出困境的女人	148
再屈辱的日子也得过	151
小保姆的传奇人生	156
打工改变了我的命运	158
坚持使我看到了希望	160
我把病人当亲人	162
藏在心里的秘密	165
身份的转换	166
女子不比男人差	169
寻找自己的幸福	172
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173

我爱北京天安门	175
---------------	-----

第五篇 成功之歌

在内蒙古的日子	180
十年磨一剑	184
苦难是财富	186
箍漏匠改行	189
小木匠的春天	195
不经意间，买了一辆东风汽车	199
创业的信念最重要	204
摸索企业经营之道	206
诚信是效益的基石	211
种菜胜过打工	212
后 记	215

第一篇 艰苦经历

黄土旱塬上的麦客子

孙林富，男，汉族，60岁，文盲。

七月的金风一吹，西兰公路沿线六盘山西坡黄土高原上的小麦就日渐泛出诱人的金黄。

早晨七八点钟，太阳还没有冒花子，沙塘镇这个西兰公路沿线的集镇上就布满了头戴草帽一手握镰肘一手提行李的割麦人，按照当地的称呼叫麦客子。与以往不同的是，集市上公路两侧还停靠了两条联合收割机的长蛇阵。雇人割麦的“掌柜的”在人群里来回扫视一遍，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有的叫上几个麦客子，有的叫上一台收割机就离开了集镇。走出集镇，联合收割机就开进了川道里的水浇地；手握镰肘的麦客子则跟在“掌柜的”后边爬上了塬台和山洼。

沙塘镇的北塬是一个旱塬，平素干旱少雨、寒冷多风，麦子长得个矮秆细而又稀疏，收割起来吃力费事。靠近山洼有一地块，可能是由于避风，麦子的长势比塬头上的好多了。

我和14岁的大孙子麦旺被掌柜领到地边，掌柜顺手指了一下田块的四至就离开了。我解开装行李的蛇皮袋子，里面是一包用牛皮纸裹着的磨得锋利的刀子，还有一块磨刀石，一个灌满水的玻璃瓶。我解开牛皮纸包裹，从里面挑了两张刀子给自己和孙子的镰肘镶上。

我先没有从地边下镰，而是跨了一步到地当中割了一股长麦子——那一坨地可能水肥格外充裕，麦子长得个高秆粗，正适合拧腰扎子。腰扎子拧好放在地上，我没有顾忌麦秆上潮湿的露水，就下镰割起来。割麦子有个讲究，刚开镰磨蹭，这一天就割不快。随着“嚓嚓”的镰响，不到一分钟两大把麦子就摆放在腰扎子上。不用看，割惯的麦把式两把就是一捆，这样大小的麦捆子无论码麦码还是摆麦摆，都是挺合式的。我拧好了腰扎子，将麦捆竖着立起来，就点上一锅旱烟开始吸起来。我想让麦子上的露水稍微晾一下再割，这样割起来既轻省力又不费刀子。

我是隆德县莫安乡孙家湾人，记得那是1991年的农历端午节早晨，我吃了妻子和大儿媳烙的花馍馍炒鸡蛋，胳膊腕上绑了几根花花绳，就背上行李提着镰肘去陕西赶场割麦子去了。我是赶麦场的熟客，知道这一阵儿西安临潼一带的麦